

工业革命与企业社会责任:共同演化的视角

肖红军 李先军

内容提要:企业社会责任是一种新的企业行为方式,这种行为方式深受制度环境、技术变革、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影响。工业革命是社会价值创造范式的巨大变革,每一次工业革命都是在技术变革基础上驱动社会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变革,进而引致一系列新的社会问题或加剧现有的社会问题,企业需要以主动的姿态和行动促进这些问题的解决;与此同时,受社会思潮的影响,企业需要履行社会责任以回应社会的压力。通过主动地履行社会责任和对社会压力的回应,企业在三次工业革命时期表现出不同的履责机制。三次工业革命与企业社会责任的发展表现出共同演进的趋势,商人以自觉行动履行社会责任成为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的主导企业社会责任形态,公司作为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的主导组织形态使得公司取代商人个人成为企业社会责任的主要履责主体,并在第三次工业革命时期朝着“平台主导的企业社会责任”演进。

关键词:工业革命 企业社会责任 社会问题 社会思潮

中图分类号:F27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636(2017)03-0101-13

工业革命是社会价值创造范式的巨大变革。每一次工业革命都带来巨大的技术变革,引起社会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思潮的变化,对制度环境、社会文化等产生剧烈影响。作为内嵌于社会网络与制度环境中的企业,其行为方式与价值创造范式也必然与工业革命的进程息息相关、相互作用甚至共同演进。特别是,企业是否应当对社会负责任、企业应当对社会承担哪些责任和应当如何对社会负责任等深层次的企业行为与价值创造问题,均与工业革命触发的制度环境、技术变革、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文化变化密切相关,均以某种方式嵌入工业革命演进脉络之中。然而,目前尚没有研究对工业革命与企业社会责任之间的关系进行探索,更缺乏从工业革命视角研究企业社会责任的演进规律,但这些对于寻找新工业革命背景下推动企业社会责任健康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工业革命与企业社会责任共同演进的逻辑

企业社会责任的发展延续着一条可追溯的逻辑主线,早期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认知是将其视为纯粹的企业或者企业家自愿的慈善行为^[1-5]。工业革命之后企业规模的迅速增长导致企业的权利和影响力扩张,基

收稿日期:2016-05-13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中国企业社会责任评价与推进机制研究”(12CGL039)

作者简介:肖红军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北京,100836;

李先军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博士后。

于权责对等的基本假设,企业社会责任被视为企业对企业权利扩大化后的必然结果^[6-7]。而随着工业革命之后“环保主义”、“人权主义”等社会思潮的发展,企业需要在单纯的获利行动之外承担社会责任以回应“社会舆论和社会思潮”的压力^[8]和社会对组织所寄托的经济、法律、伦理和自由裁决的期望^[9],并通过社会责任的承担向利益相关方履行一组多边^[10]或者综合的社会契约^[11],同时以社会责任这一新的价值创造方式实现企业的财务和战略目标^[12-14],进而实现企业的社会价值^[15]。工业革命的发展,推动了企业社会责任理念和认识不断进步,也推动了企业履责方式、履行行为的不断丰富,工业革命与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出共同演进的历史逻辑。然而,由于企业社会责任与工业革命都是囊括众多概念的系统,理解企业社会责任和工业革命的内在关系需要在这个抽象的复杂系统中理出清晰的逻辑主线,这个逻辑主线就是企业社会责任与工业革命的内在关系逻辑。

工业革命首先是一场技术革命,这场技术革命推动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变化,同时可能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对这些社会问题的回应和主动行动构成了企业社会问题的基本形态。以技术、能源和交通通讯为基础的三次工业革命决定了社会生产过程中生产工具的选择、组织形态的设计和竞争方式的变化。在新的社会生产方式的推动下,社会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社会财富的增长与两极化问题被放大,人类的集聚方式在工业革命过程中朝着前所未有的速度推进着城市化的发展,人类的衣食住行等行为方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的变化也使得工业革命所带来的副产品——社会问题表现出新的特点,一些新的社会问题出现,同时旧的社会问题在工业革命背景下被放大。这些社会问题尽管不完全是工业革命引致的,但工业革命却是重要的“催化剂”,“因为企业影响了社会,那么它就必须接受随之而来的社会义务”^[16],企业需要回应这些问题,并以主动的姿态和行动促进这些问题的解决,这一过程是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过程,可称之为工业责任与企业社会责任的关系路径 I (见图 1)。

然而,这些社会问题是否应该由企业承担,应该承担多少以及如何承担是受到文化制度和法律制度等因素的影响。社会文化制度“是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在长期的社会政治经济实践活动中,逐步形成的一种被普遍遵循的人文精神、

价值观念,行为方式以及根深蒂固的习惯势力,是一种没有文字的历史沉淀。它不是通过制度规范和法律条文的形式来表现它的存在,而是通过潜移默化的方式因袭传承。”^[17]它以一种“难察觉”的“内在作用”影响社会中人的行为,甚至对法律制度的形成和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社会生产、生活方式的变化及社会问题的严峻性使得人类开始对工业革命进行反思,开始对工业革命的主体——企业的行为进行反思,开始对工业革命中人的地位和角色进行反思,开始对工业革命中社会发展模式进行反思,开始对人类与自然之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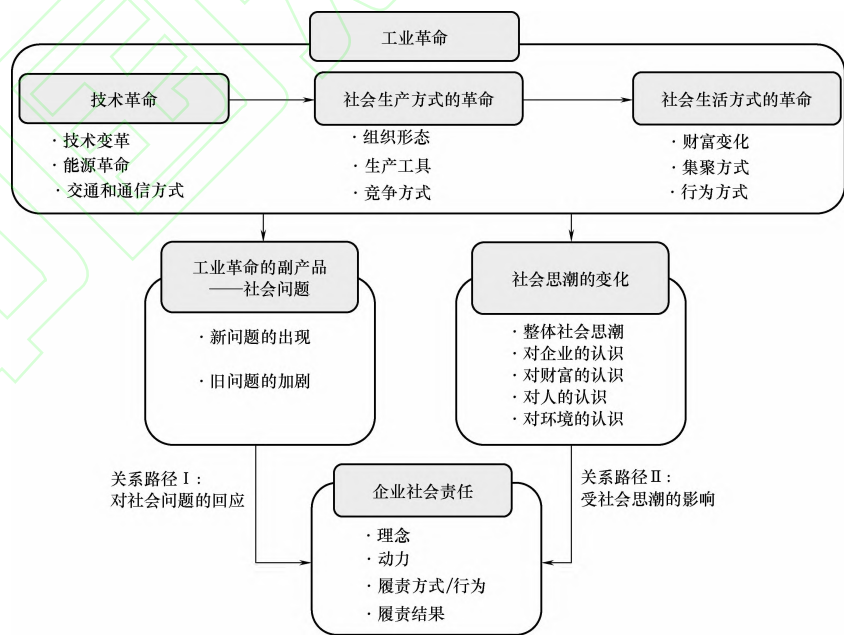


图 1 工业革命与企业社会责任的关系路径

的关系进行反思,这些反思就带来了社会思潮的新变化,且在工业革命的不同阶段表现出不同的特点。这些思潮的变化和发展对企业产生了重要影响,企业为了适应变化着的社会环境,需要将这些社会思潮融入企业的经营管理过程中,这个过程是对企业作为“纯粹经济组织”的一种发展,企业在履行“经济责任”的同时履行了“社会责任”。社会思潮既是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压力,也是企业主动承担社会责任的理论指导,这是工业革命和企业社会责任的关系路径 II。

工业革命引发的社会问题和社会思潮的变化使得企业需要对这些社会问题、社会思潮进行回应,并在社会思潮的影响下从被动回应朝着主动行动演变,从而促进社会责任发展。

二、第一次工业革命与商人主导的企业社会责任

珍妮纺纱机的发明和瓦特蒸汽机的使用是英国工业革命的技术性标志,随着棉纺织业的发展及对机器制造需求量的提高,钢铁、煤炭、铁路运输等产业快速发展起来,形成纺织业、钢铁业、煤炭业和铁路运输业等主要现代工业门类。第一次工业革命是人类从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的决定性事件,它改变了社会的生产生活方式,但也带来诸如城市病、环境污染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受古典自由主义和宗教文化的共同影响,商人在这一阶段以一种主动的、零散化的行为履行一定的社会责任,这一阶段可称之为“商人主导的企业社会责任阶段”。

(一) 社会生产生活方式的剧变与突出的社会问题

蒸汽机的使用带动了煤炭、钢铁等行业的发展,人类从农业生产为主导过渡到以工业生产为主导,人类生产产品从农产品扩展到工业制品,工业取代农业成为社会生产的主导产业,生产组织朝着大型工厂化的方向发展,且在人类摆脱水力和风力之后,企业布局从河流湖泊周边向具有更多人口的城市和更多煤炭、钢铁资源的地区聚集。这一阶段企业的竞争更多体现为企业主个人能力和影响力的竞争,更有能力的企业主在技术运用、内部管理、市场开拓等方面具有显著的竞争优势,企业主个人的影响力会使其在资源获取、员工管理和市场方面更有成效。

第一次工业革命,生产力的极大发展带来了社会财富的快速增长,生活条件也得到了极大的改善,进而促进了人口的快速增长。工业集聚促进了城市化进程,更多的人生活在中国,城市成为社会活动的主要载体。但是,受制于社会财富和财富分配的限制,第一次工业革命下社会生活还停留在基本的谋生层面,圈地运动之后的农民转移到城市成为工人、家庭作坊和手艺人成为工厂化的工人,他们的生产活动是为了个人及家庭生存的需要,社会生活活动的形式更多地考虑短期生存和职业发展的问题。但工业的发展促进了人类消费对象的丰富化,工业产品成为新的消费对象,工业品消费随着工业革命进程的推进在全部消费品中的比例不断增长。

工业革命在创造财富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其中最为严重的是工人工作条件恶劣,童工、女工问题以及城市病。在工厂生产条件下,企业主竭力增加劳动强度,极大地影响到工人体的身体健康,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所描述的,“曼彻斯特保健医官李医生证实,该市富裕阶级的平均寿命是 38 岁,而工人阶级的平均寿命只有 17 岁。在利物浦,前者是 35 岁,后者是 15 岁。可见,特权阶级的寿命比他们的不那么幸运的同胞的寿命要长一倍以上。”围绕工人工作条件的问题,英国工人们掀起了广泛捣毁机器的“卢德运动”作为对资产阶级剥削和压迫的反抗,但这并未从根本上改善员工的工作条件问题。为了勉强的温饱,童工和女工不得不忍受恶劣的工作条件并参与到经济活动中^[18]。与此同时,大量人口向城市集中带来

较为严峻的“城市病”问题,尤其住宿、城市卫生恶化等。老汤恩比在论述英国人口流动时写道:“在1751年以前,每十年最多增加3%,在以后的每三个十年增加6%。在1781年和1791年之间增加9%,在1791年和1801年之间增加11%,在1801年和1811年之间增加14%,在1811年和1821年之间增加18%。”^[19]

工业化的生产方式必然追逐效率和利润,企业主对工人的剥削成为必然,而工业革命过程中劳动者和土地的分隔也使得更多的劳动力,尤其是妇女和儿童为了自身的生存加入到生产队伍中;与新的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生活方式的变化使得城市容纳了更多的人口。尽管工业革命与这些问题的发生具有高度的同步性,但其是否由企业来承担,在第一次工业革命时代很难得到满意的答复,这一时期这一议题成为企业主的个人选择问题。

(二) 社会思潮及其对商人履行社会责任的影响

作为一种新的价值实现与行为方式,在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企业社会责任概念尚未出现,但古典自由主义(classical liberalism)思潮和根植于民众生活中的宗教传统以不同的方向影响企业履行社会责任。

洛克奠定了古典自由主义,并经由苏格兰启蒙运动发扬光大,亚当·斯密所推崇的“看不见的手”和“守夜人”是对古典自由主义的经济学的阐释。在古典自由主义者眼中,个人财产权神圣不可侵犯、自由市场经济是完美的,经济生活按照其本身的规律来发展,而置身于经济之外的政府不得加以任何干预。在古典自由主义的指引下,“产权神圣不可侵犯”原则深入人心,企业作为财富的拥有者,应该成为纯粹的经济组织并以“利润最大化”为基本准则,而政府应当扮演好市场“守夜人”的角色,工业革命进程中的社会问题,尤其是经济问题应当交由市场自身调节。这也导致诸如工作条件、童工、女工等问题得不到企业的重视。第一次工业革命打破了中世纪的宗教传统,科学成为新的潮流,人类敢于探索自然并改造自然,对自然的认识突破了宗教神学的“上帝创造”主张,人类开始改造自然,但受生产力和技术的约束,人类的改造能力有限,人类将自然居于对立面来看待和处理。此外,人类历史长期的供给不足使得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生产力的快速增长形成“供给创造需求”的认识,企业在企业内和市场交易中居于主导地位,而员工和顾客相对于企业居于被动地位,这也导致“强势”的企业无需对其他群体负责。然而,根植于西方的宗教传统却从不同的方向来认识这些社会问题,宗教的各种规定也会约束信徒们的行为,虔诚的宗教信徒通常面临着严格的约束^[20]。工业革命所建立的市场体系“归根到底更为依赖的是宗教约束”,而“真理、承诺、信用、义务、节制这些以信仰为基础的社会美德,正在个人主义契约经济的运行中起着核心作用”^[21]。基督教教义中的“博爱”、“原罪”、“互济与自愿精神”^[22]对商人行为具有引导和约束的作用。

在古典自由主义思潮和西方宗教文化传统的共同影响下,这一阶段的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出较高的柔性特征,企业的社会责任不是“普遍的”,而是少数商人的个人选择。一些商人从个人道德出发改善员工工作条件,这是一种“朴实主义的个人社会责任”,这一阶段可称之为“商人主导的企业社会责任阶段”。

(三) 商人主导的企业社会责任的主要特征

在这一阶段,宗教传统内化于商人的行为之中,商人“按社会的目标或者价值向有关政策靠拢,做出相应的决策,采取理想的具体行动的义务”^[23],以被动回应或主动行动履行着企业的社会责任。商人主导的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出如下特征。

首先,基于宗教传统和个人道德,商人以个体化行为履行社会责任。古典自由主义排斥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受主张建立深刻的社会良知和完全恪守个人和社会道德的严格标准的维多利亚价值准则(大约于1800年左右开始形成)以及基督教中的“博爱”、“互济与自愿精神”等思想的影响,商人从个人道德出发,以改善员工

工作条件、提高员工待遇和少量的捐助保证企业生产的连续性并赢得“尊重”。商人的履责行动表现出随机性和个性化的特征,空想社会主义者罗伯特·欧文、工厂管理的先驱者查尔斯·巴贝奇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其次,商人履责形式多样化,但主要关注于员工工作条件的改善和少量的社会慈善行为。例如,工厂主、议员罗伯特·皮尔 1801 年在英国下院提出了《学徒工健康与道德法案》,并很快被通过,这是著名的第一个工厂法^[24],也成为企业社会责任的立法基础^[20]。然而,这一法案并未从根本上保护童工和妇女,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更好的机器取代了一些简单的工作任务,使得企业雇佣儿童和妇女不经济,正是发展的资本主义这种经济力量使得儿童和妇女摆脱了笼罩在她们身上的威胁。针对城市化带来的拥挤和城市卫生恶化问题,建筑商人乔治·皮鲍迪和悉尼·沃特娄开展了“模范住宅”运动。1884 年,沃特娄以每间 2 先令 1.25 便士的周租金为 2.5 万人建造了房屋,皮鲍迪董事会以 1 先令 11.5 便士的周租金满足 2 万人的住房需求,这既有助于伦敦当时社会问题的治理,投资者也获取了预期回报,这种履责行为已经表现出“工具理性”的基本特征^[25]。

第三,社会责任的履行使得商人得到了良好的社会声誉以及尊重,进一步促进了商人财富的增加。商人通过改善员工工作条件,提高了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和个人绩效,进而促进了商人个人财富的增长。通过社会慈善活动可以提升商人的社会声誉,有利于市场的扩大和吸引更多的顾客,进而有利于商人财富的进一步增加。

三、第二次工业革命与公司主导的企业社会责任

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技术标志是电力和内燃机的广泛应用,人类由此迎来了电气化的浪潮。第二次工业革命带来人类生产方式的革命,进而促进人类生活方式的变化,与之相随的是一系列旧的社会问题的加剧和新社会问题的产生。企业从“工具理性”角度出现,企业社会责任朝着公司主导的企业社会责任阶段演进。

(一) 社会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变化与社会问题的加剧

电力和内燃机技术促进了机械、冶金、石化、钢铁等重化工业和相关产业(例如汽车制造、飞机制造等)的快速发展,重化工业主导的产业结构使得规模经济成为企业获取竞争优势的重要来源。为获取规模经济优势,规模化和流水化生产成为第二次工业革命时代的重要标志,并进一步发展出 TQM、JIT 等生产方式。规模化的生产方式也必然要求大型组织与之相匹配,社会生产表现出集中化的趋势。以美国为代表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实现了从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企业规模发展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并形成托拉斯为主导的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垄断形态(到 1905 年大约有 300 家拥有 70 亿美元投资的公司控制了美国制造业的 40%),并朝着全球公司发展。经历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沉淀,长期困扰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短缺经济”开始朝着“过剩经济”转变,市场竞争白热化,市场竞争从商人能力和影响力的竞争发展成为公司主导的企业组织的竞争,并在规模经济时代朝着战略联盟的竞争和合作方向发展。随着人类社会财富的进一步增长,人类的消费能力也急剧增长,对石油化工制品、钢铁制品等的消费迅猛发展,人类对资源的索取超过了之前的任何一个时代,强大的消费能力对自然形成巨大的压力。延续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城市化进程,第二次工业革命促进城市化水平进一步提高(1940 年美国的城镇化率达到 56.5%,140 个大城市居住着全美 48% 的人口)^①。

① 数据来源:阿瑟·林克,威廉·卡顿著,刘绪贻,等译.1900 年以来的美国史(上册)[M].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年 6 月,第 292 页。

第二次工业革命在促进社会生产生活方式巨大变革的同时,也导致一系列社会问题的出现,而原有的一些社会问题在这一阶段被放大,例如环境污染、生态破坏、资源枯竭、种族歧视、不道德商业行为等,劳资关系、城市病、两极分化等作为老问题被延续下来。在这一阶段,自然资源的再生速度和环境的恢复能力远低于工业生产的扩张速度,生产的快速扩张也带来消费的快速增长,且二者之间表现出一种互相强化的关系。大量的工业品消费需要大量的能源和物资供给,其中尤以对石化能源和矿物资源的需求最为巨大。人类的高消费带来了大量的环境和生态问题,例如汽车尾气的排放、生活废水、固体垃圾的排放等。此外,这一时期也是全球化加速期,跨国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为获取资源或者开拓市场,会采用贿赂、军事支持、政治游说等方式,这些不道德的商业行为已成为全球性的经济社会问题。劳资关系得到了一定的缓和,这主要取决于经济发展所带来的财富增加,但二次工业革命带来更为激烈和严峻的竞争进一步加剧了两极分化,劳资双方的收入鸿沟越来越大,并具有强烈的“代际传承效应”,成为引发下一代社会问题的重要原因。更高水平的城市化对城市功能和服务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先发国家在工业革命进程中积累经验并不断修正城市化过程中的问题,“逆城市化”以及更为科学的城市规划和布局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城市化过程中的社会问题。全球公司的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全球的政治和军事动向,资本主导的政治力量往往引致局部和世界范围内的战争,造成极为严重的人类灾难。

(二) 社会思潮的变化及其对公司履行社会责任的影响

二次工业革命进程的加快,伴随着“工厂条件、贫穷、社会分化瓦解和流离失所等大量问题,于是人们就求助于政府,使政府的权力空前增长,两次世界大战更使政府的规模不断扩大”^[26],这是国家干预自由主义(new liberalism)影响的结果。国家干预自由主义者倡导“积极”的自由和责任型政府,他们主张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主张通过税收等手段来干涉经济、调控市场,对财富的一次分配予以调整,并在此基础上借助法律手段对社会财富进行二次分配。国家干预自由主义者认为,国家有义务“创造这样一些经济条件,使身心没有缺陷的正常人能够通过有用的劳动使他自己和他的家庭有食物吃,有房子住和有衣服穿”。代表人物约翰·密尔发展了“自由”的概念,即“个人的行动只要不涉及自身以外什么人的利害,个人就不必向社会负责交代……关于对他人利益有害的行动,个人则应当负责交代,并且还应当承担或是社会的或是法律的惩罚”^[27]。格林也进一步阐释了“个人自由”的概念,在他看来,个人自由的实现不是无限度的,任何人或阶级都不能以牺牲他人的自由为代价来获得自由^[28]。霍布豪斯指出:“自由也不以个人的自作主张为基础……自由也不与纪律、组织、对正确和公正的坚强信念对立”^[29]。这是对古典自由主义“放任自由”的发展,为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奠定了思想基础。国家干预自由主义的发展促进了经济主体(企业和个人)在“有限制的自由框架内”开展经济活动并承担社会责任,也促进了政府干预经济的发展,使得第二次工业革命期间企业的社会责任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企业社会责任发展到新的阶段。

在国家干预自由主义的整体背景下,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社会思潮也出现了新变化,对企业本质、财富、员工和顾客、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等方面都出现一些新的观点和看法:(1)企业规模的扩大和垄断使得企业拥有更多的权利,在“责任铁律”的逻辑下,扩大化的企业权利对应更多的责任,这也为企业从承担单一的经济责任到承担复杂的社会责任奠定了理论基础。(2)股份公司的快速发展使得股东分散化成为常态,公司股份及其对应的企业资产事实上已变成社会共有财产,公司也就成为社会财富的托管人;公司掌握着社会财富,也必然需要为增进社会福利而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3)随着管理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对员工的关注已从个人扩散到群体,“霍桑实验”发现了良好的人际关系有利于企业产出的改善,福莱特提出通过“整

合”协调雇员和雇主利益,并将这一概念扩展到公司与外部环境中,例如债权人、股东、客户、竞争者、供应商及社区,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过程中“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4)人类重新认识自身与自然和环境之间的关系,环保主义、可持续发展观、后现代主义、人本主义等思潮不断涌现。

在这些社会思潮的基础上,企业社会责任理论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表现出蓬勃的发展态势,但这些社会责任理论更多的是对第二次工业革命社会问题和社会思潮的回应,理论发展滞后于现实问题。20世纪50年代开始,美国企业将承担社会责任(关注于雇员、顾客以及一般大众)和慈善活动^[30]作为对企业获取利润的补充,企业社会责任从企业个体行为朝着公司组织的行为演进。尽管20世纪60年代人权、女权、消费者权利及环保运动得到快速发展,但主流观点认为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会削弱企业利润目标^[31],企业社会责任依然让位于企业利润目标。20世纪60—70年代是“企业社会责任的觉醒和重视时代”^[32],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态度开始朝着更加积极的方向发展。弗雷德里克(Frederik,1960)认为企业的资源应该用于更广泛的社会目标^[33],麦奎尔(McGuire,1963)认为企业应该承担除经济和法律之外的社会责任,社会责任关注的内容极其丰富,诸如社区事务参与、对城市衰落、种族歧视、污染环境和慈善的关注等^[34]。但这一时期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关注主要来自于外部环境及社会意识运动的刺激,并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关注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关系的研究。弗雷德里克(Frederick,1978)正式提出CSR1与CSR2,前者企业居于履行社会责任的地位,后者关注于企业为了既定目标而履行社会责任^[35],企业从被动地回应社会问题和社会思潮步入了主动行动阶段。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理论界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实证研究增加,关注于企业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关系的研究,并在企业主动承担社会责任的基础上引入了企业伦理、企业公共政策、利益相关者等概念,进一步丰富了企业社会责任的内涵。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企业社会责任的关注点发生了变化,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关注全球化,对企业全球市民的研究开始出现。

(三)公司主导的企业社会责任主要特征

新社会问题的出现、旧社会问题的加剧,社会思潮对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给予了充分肯定和关注,这些推动着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企业社会责任的快速发展。在这一阶段,公司取代商人个人成为企业社会责任的主要履责主体,因此,这一阶段可称之为“公司主导的企业社会责任阶段”。

履责动机从道德动机的随机履责发展到以商业为目的的“工具主义”履责,并表现出“价值履责”的趋势。这一阶段的企业社会责任是一种管理哲学,是首要的商业方法^[36],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是为了获取财务绩效的改善,或是出于声誉维护、利益、战略整合、学习、创新和风险管理的目的^[37],或是出于降低成本和风险、获取竞争优势、培养声誉和合法性以及通过协同价值创造寻求双赢^[38],或是为了在实现经济目标的同时与外部市场优势的协调。通过社会责任的履行,有利于与企业战略链接起来获取有利于回馈社会的商业机会^[13]。此外,这一阶段的部分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也是出于社会价值动机,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动机无关乎经济原因,“社会责任价值是组织的生命之源,并且以各种形式整合进组织之中”^[36]。

在政府干预的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下,政府也在不断通过立法活动推动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并成为指导和规范企业经营管理活动的依据。针对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造成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等问题,英国1863年颁布《碱业法》、1876年颁布《河流防污法》,日本大阪府1877年颁布《工厂管理条例》等,此后美国、法国等也陆续颁布了防治大气、水、放射性物质、食品、农药等污染的法规^[39]。针对企业在追逐利润过程中可能出现产品质量和损害消费者的问题,美国1906年颁布《肉制品检查法案》和《食品法》。针对企业可能存在的不正当竞争行为,美国1914年颁布《克莱顿法案》和《联邦贸易委员会法》,1933年颁布《证券法案》,

1934年颁发《证券交易法案》等。为鼓励企业开展慈善事业,1917年美国德克萨斯州第一个通过《企业慈善法案》,随后纽约于1918年,伊利诺伊州于1919年,俄亥俄州于1920年相继通过了允许企业进行不直接与企业利益相关的慈善活动的法案^[40]。

四、新工业革命与平台主导的企业社会责任发展

从20世纪中期计算机的发明,到20世纪70年代新能源^[41]、新材料^[42]的开发和应用,到20世纪末互联网革命的快速推动,第三次工业革命正在全球悄然发生,如前两次工业革命一样,引发了人们生产生活方式的重大改变。这些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变化也带来一系列新的社会问题,此外,由于社会生产方式的创新依然延续,新的社会问题还会出现。基于社会问题和社会思潮的变化,需要重新审视现有企业社会责任,形成适应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指导规范。

(一) 社会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变化及其趋势

第三次工业革命首先带来生产方式的变革。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智能制造、3D打印、物联网等新的技术手段塑造了新的技术范式,使传统基于标准化、规模化和流水线的生产方式被定制化、柔性化和智能生产所替代,制造模式则从削减式制造转变为叠加式制造。其次,互联网和分布式能源使分布式生产和小规模制造具有经济性,“分散生产、就地销售”具有强大的适应性,更加个性化的社会需求使生产的社会性特征显著,中小企业在经济系统中的重要性更加突出,成为支撑经济系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力量。此外,新工业革命重塑了经济系统中的组织形态,网络化、平台化、自组织成为组织创新的关键词。“分散生产、就地销售”的生产方式、共享经济、平台经济的快速发展,特别是互联网技术的广泛深入应用,促使企业组织从集权化层级式到扁平化网络格式演进,基于传统假设的“层级组织”被自治性的“节点网状组织”所替代。新工业革命是一次产业架构的革命,是价值链或价值网络重新构架的过程^[43],企业平台和生态圈成为主导的市场组织形态,竞争范式也从传统单企业竞争朝着企业平台或者生态圈的竞争转变,竞争的结果是平台的相互融合和生态圈的不断扩展和更新。

与生产方式相对应的生活方式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首先,知识和创意将成为人类最重要的财富来源。人力资本的从属地位发生了逆转。其次,与分散化生产相对应的是人类生活的去中心化,社群成为新的人类集聚方式。人类的集聚从实体地理空间的集聚(城市化)朝着虚拟空间集聚,形成同时存续在网络和现实中的社群。社群成员在去中心化的网络空间交互,通过现实空间进行交易,相互重叠和补充,成为社会网络的主导群体。第三,自生产自消费和绿色消费成为新的生活方式,消费者根据自己的创意自己设计,并通过市场网络和产业化的3D技术实现自生产自消费,并在新的道德高地之上形成更高水平的绿色消费。第四,各种类型的社会组织、非政府组织从线下拓展到线上,并在经济社会生活中扮演着更加重要的角色,促进了“虚拟+现实”社会责任生态圈的形成。第五,第三次工业革命引起人们的沟通方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新的“一对多”、“多对多”的沟通方式成为网络沟通的常态,催生了自媒体、网络社区等新型沟通方式和沟通渠道的兴起,互联网、移动互联、高速机车等交通通讯方式进一步改善了人类的沟通与交往。

(二) 新旧交替的社会问题及社会思潮

新工业革命带来生产与生活方式的巨大变化,一些原有的社会问题在新的技术范式下得到了较好的解决,但也引发了一些新的社会问题。智能制造、可再生能源的高速增长、基于云计算和大数据的产品溯源模式等,使传统工业时代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资源枯竭、产品安全等问题得到了有效的缓解。与此同时,由

于技术范式的革命性变革,一些新的社会问题开始出现,例如智能化可能引发机器对人类替代的忧虑、虚拟的社群组织可能会出现的道德危机、互联网的发展尤其是网络的虚拟化和电子商务对传统产业的替代,生物转基因可能引发的物种入侵和生态安全问题等。

在生产生活方式变化及新的社会问题出现的现实背景下,社会思潮出现了新变化。第三次工业革命将人类置于巨大复杂的技术互联网和社会网络之中,互联、共享、互动取代个人主义成为更重要的社会精神,“我们逐渐意识到,真正的自由并不是对他人负责的孤岛,而是存在于与他人的紧密联系之中”^[40]。与社会网络发展相适应,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取代传统无限制的古典自由和政府干预的自由主义成为西方社会的主导思想^[44]。在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对企业本质的认识、对商业本质的认识、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等理念发生了重大变化。(1)个人和企业的“自利性”假设受到严峻的挑战。第三次工业革命在创造社会财富的基础上,为人类进入全球型的社交空间提供了条件,个人表现出一些“利他性”特征,他们愿意在不索取报酬的条件下用自己的时间和才智为他人谋福利和创造价值,即人们行为的驱动力来自“对社会性的需要和集体性的寻求”。与之相对应的是,企业存在的基本假设也发生变化,企业被视为通过为社会提供商品和服务与有效管理内嵌于商品和服务提供过程中的人与人的关系而增进社会福利的重要主体,企业与社会之间应是一种耦合和共生的关系。(2)第三次工业革命改变了企业与企业、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关系,促进了相互之间的合作与共赢发展,构筑了共生型商业生态系统。第三次工业革命使企业需要实时响应需求,并需要消费者在企业生产过程中深度参与甚至朝着“产销者”发展,企业与消费者在共同成长中合一。第三次工业革命进一步加剧了企业之间的竞争,形成实时的、全球性的超竞争状态,迫使企业之间更重视合作,以合作实现利益共享和风险共担,构筑更富活力的商业生态圈。(3)对资源认知和配置的新变化。第三次工业革命丰富了资源的内涵和范畴,知识、信息、社会关系等无形资源更具价值,并使原有依存于土地、资本和设备等物质资源之上的人力资源、信息资源更具独立性,甚至无形资源确定了有形资源的价值。在移动互联、大数据、云计算的基础上,传统被视为“闲置”的资源被发掘出来,通过多种商业模式的创新,“闲置资源”转变为“冗余资源”进而演变成为“价值资源”,企业获取资源的方式更多地依托于“整合”而非“新建”,且在超竞争状态下资源会朝着具有更高投资回报的企业流动,资源配置效率更高。

(三)企业社会责任发展的新趋势

第三次工业革命还在继续推进,国际上新的社会问题出现和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发展,推动了企业社会责任不断发展,其表现出如下几个方面的趋势。

一是对企业原假设的改变推动社会责任理念朝着“价值理性”发展。在个人“道德人”和企业多功能目标的新假设认知下,创造社会价值成为企业的重要使命和目的,承担社会责任内化为企业的基因,这就使得企业“自我驱动”承担社会责任,将外部推动和压力下的社会责任朝着内在的价值理性转变。企业社会责任从“战略导向观”朝着“平衡观”的方向发展,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对相关利益主体的关注度和平衡度得到有效提高。受社会问题的变化和社会思潮的影响,社会责任理念从“道德责任”到“工具理性”发展到“价值理性”,社会责任理念在第三次工业革命阶段朝着更加注重整合的方向发展。

二是商业模式的变革促进合作性责任生态圈的形成,改变了企业的履责方式。在共享合作的商业生态圈中,企业个体更加重视企业合作网络或生态圈履行社会责任的模式,更加愿意参与并推动企业所在的整个商业生态圈的建设,并寄希望于商业生态圈的发展为个体企业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与此同时,对于行业内的“领头企业”,在共享经济、合作经济等理念的指导下,更强调创建更多企业合作参与的履行社会责

任平台和生态圈。

三是资源配置变化和竞争方式变化引起履责议题更加强调动态发挥比较协同优势。在超竞争态势和共建生态圈的背景下,企业在履责议题选择时更加注重价值理性,并将个体企业比较优势与生态圈和个体企业发展相结合,选择发挥协同比较优势的履责议题,并在企业和生态圈发展过程中动态调整,实现个体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和生态圈履责目标的共同实现。

四是组织形态变化引起履责管理更加强调价值观与开放参与管理。公民社会的兴起和地位提升要求企业的社会责任管理更加重视非营利组织、非政府组织和社会团体的参与,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使企业的社会责任管理必须对网络成员开放,并且更加重视位于网络节点上关键利益相关方的参与。与此同时,新工业革命下扁平化的组织结构和责任边界的动态性使得集权被分权所取代,控制被自主所替代,传统的指令管理(MBI)模式和目标管理(MBO)模式在企业社会责任管理领域变得不适应,取而代之的是采取价值观管理(MBV)模式,充分发挥社会责任作为企业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作用和全体员工履行社会责任的自主性。

五是履责主体从大公司主导朝着商业生态圈内各主体共同参与的方向发展,参与主体的多元化特征日趋显著。新工业革命的分散式生产、多元化需求等市场调整的变化,使得中小企业在经济系统的重要性不断上升,中小企业在未来所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应更大,目前以大型企业社会责任为重点甚至中心的推动模式将会被更加强调和重视中小企业与个体社会责任的推动模式所取代。

五、工业革命与企业社会责任共同演进的规律总结

(一) 三次工业革命与企业社会责任共同演进路径

基于工业革命与企业社会责任的关系逻辑,三次工业革命的技术基础不同,其对社会生产生活方式的影响作用不同,进而引发不同的社会问题及社会思潮的变化,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责主体、动力、履责方式和结果均表现出差异,企业的社会责任总体上延续“商人的社会责任—公司主导的社会责任—企业平台的社会责任”的逻辑发展(见图2),企业社会责任与工业革命表现出共同演进的趋势。然而,由于各国、各地区工业革命发展阶段的差异性,三次工业革命和企业社会责任共同演进的三个阶段不断交叉和融合,形成同一阶段企业社会责任的“丛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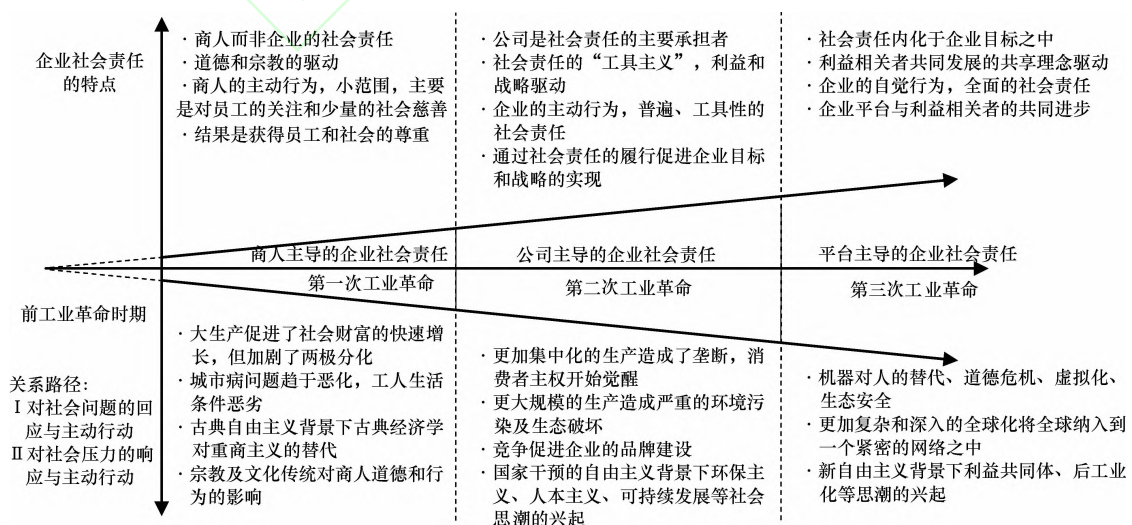


图2 三次工业革命与企业社会责任共同演进的路径

(二)三次工业革命和企业社会责任共同演进的总体特征

基于三次工业革命和企业社会责任共同演进的基本逻辑和脉络梳理,三次工业革命引发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变革以及其由此带来的社会问题,社会思潮的变化与企业社会责任的特点以一种共同演进和发展的方式表现出来(见表1)。

表1 三次工业革命和企业社会责任共同演进的总体特征比较

		第一次工业革命	第二次工业革命	第三次工业革命
技术革命	技术基础	珍妮纺纱机、瓦特蒸汽机	内燃机、发电机、电动机	能源工业、生物工程、信息技术等
	能源革命	煤炭的广泛利用	电力、石油引发的能源革命	核能、风能、太阳能、潮汐能等新的分布式能源
	交通及通讯革命	铁路	电话、电报、远洋轮船、飞机、高速公路	互联网、高速机车
社会生产方式	组织形态	工厂对手工作坊的替代	高度集中和垄断的生产组织,例如跨国公司、托拉斯组织等	大型的平台企业和网状的小组组织共生
	生产工具	蒸汽动力的纺纱机、织布机及火车	电力、内燃机	计算机、互联网、移动终端、3D打印机等
	竞争形态	企业主个人能力和影响力的竞争	公司为主体的企业形象、品牌的竞争	平台及生态圈的竞争
社会生活方式	集聚方式	第一次城市化高潮	出现第二次城市化的高潮,“逆城市化”显现出现	去中心化、高度契合的社群组织成为新的集聚方式
	行为方式	工业品消费的快速增长	高消费,尤其是物质产品的消费	产销者、绿色消费、绿色投资
社会问题	新的表现形式	员工工作生活条件恶劣、城市病、种族歧视	环境污染、生态破坏、两极分化、种族歧视、不道德商业行为、战争	机器对人的替代、道德危机、虚拟化、生态安全
	根源	经济不发达、政府社会管理能力较低、企业处于原始积累阶段	高度发达的工业生产造成的污染和破坏超过环境自身承受和净化能力、企业全球化过程中的文化冲突和经济冲突、政府社会管理效能有待提高	社会大众尚未能跟上技术的发展步伐,对未知的不可预期
社会思潮	主流思潮	古典自由主义 (classical liberalism)	国家干预自由主义 (new liberalism)	新自由主义 (neo-liberalism)
	对企业的认识	利润最大化的主体、价格容器	企业具有多元目标,企业需要关注利益相关者	共享的、社会化的经济组织和平台
	对财富的认识	企业是财富的所有者	企业是财富的受托者	企业是财富的使用者
	对人的认识	工具主义、成本观的雇员“任人宰割”的顾客	资源观、资本观的雇员创造价值的顾客	合伙人观的员工共赢的顾客
	对环境的认识	人与自然的对立和冲突	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人类与自然的共生发展
企业社会责任	主导理念	商人的社会责任阶段	公司主导的社会责任	企业平台主导的社会责任
	履责主体	商人个人的社会责任	公司作为最重要经济组织的社会责任,包括股东、经营管理人员、员工等共同承担的社会责任	企业平台生态圈的社会责任,生态圈内的物种和群落都是履责主体

表1(续)

	第一次工业革命	第二次工业革命	第三次工业革命
履责动力	道德和个人正义感	促进企业战略目标及经济绩效的实现(成本、竞争优势、声誉、财务目标等)	协同价值创造共赢
履责形式	改善员工工作条件、少量的慈善活动	关注员工及利益相关者、对生态环境和资源的保护、捐赠	为满足平台生态圈内的各物种和群落的平衡需求
履责结果	生产的连续性、好的个人声誉	企业财务目标及衍生目标的实现	企业平台生态圈的成长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参考文献:

[1] CLARK J M. The changing basis of economic responsibility[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16, 24(3): 209 - 229.

[2] SHELDON O. The philosophy of management[M]. London: Sir Isaac Pitman and Sons Ltd., 1924.

[3] BERLE A A. Corporate powers as powers in trust[J]. Harvard Law Review, 1931, 44(7): 1049 - 1074.

[4] DODD E M. For whom are corporate managers trustees? [J]. Harvard Law Review, 1932, 45(7): 1145 - 1163.

[5] HOWARD R. Bowen. Social responsibility of the businessman[M]. New York: Harper and Brothers, 1953: 48.

[6] DAVIS K. Can business afford to ignore social responsibilities? [J]. California Management Review, 1960, 2(3): 70 - 76.

[7] DAVIS K. Understanding the social responsibility puzzle: what does the businessman owe to society? [J]. Business Horizon, 1967, 10(4): 45 - 51.

[8] FREDERICK W C. Toward CSR3: why ethical analysis is indispensable and unavoidable in corporate affairs[J]. California Management Review, 1986, 28(2): 126 - 141.

[9] CARROLL A B. The pyramid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toward the moral management of organizational stakeholders[J]. Business Horizons, 1991, 34(4): 39 - 48.

[10] FREEMAN R E, EVAN W. Corporate governance: a stakeholder interpretation[J]. Journal of Behavioral Economics, 1990, 19(4): 337 - 359.

[11] DONALDSON T, DUNFEE T W. Toward a unified conception of business ethics: integrative social contracts theory[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994, 19(2): 252 - 284.

[12] PORTER M E, KRAMER M R. 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 of corporate philanthropy[J].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2002, 80(12): 56 - 68.

[13] PORTER M E, KRAMER M R. The link between competitive advantage and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J].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2006, 84(12): 78 - 92.

[14] 戴天婧, 汤谷良. 企业社会责任与管理会计创新[J]. 经济与管理研究, 2015(8): 139 - 144.

[15] 李伟阳, 肖红军. 企业社会责任的逻辑[J]. 中国工业经济, 2011(10): 87 - 97.

[16] DAVIS K, BLOMSTROM R L. Business and its environment[M]. New Jersey Prentice Hall, 1993: 237 - 238.

[17] 吕政. 论另一只无形的手——社会文化传统对经济发展的影响[J]. 经济管理, 2001(2): 6 - 9.

[18] 丹尼尔·A·雷恩. 管理思想的演变[M]. 孙耀军, 等, 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6.

[19] TOYNBEE A. Reviewed work: lectures on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england[M]. London: Rivingtons, 1884.

[20] CONROY S J, EMERSON T L N. Business ethics and religion: religiosity as a predictor of ethical awareness among students[J].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2004, 50(4): 383 - 396.

[21] 邹穗. 英国工业革命中的福音运动[J]. 世界历史, 1998(3): 55 - 62.

[22] 韩丽欣, 郑国. 中西方慈善文化传统资源的比较研究[J]. 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4(1): 104 - 109.

[23] HOWARD R B. Social responsibility of the businessman[M]. New York: Harper and Brothers, 1953.

[24] 保尔·芒图. 18世纪产业革命[M]. 杨人梗,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3.

[25] 克拉潘. 现代英国经济史(中卷)[M]. 姚曾虞,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75.

- [26]陶红梅,陈葵阳.西方自由主义的源与流[J].学术界,2015(5):170-180.
- [27]约翰·密尔.论自由[M].许宝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
- [28]武彬.格林的社会自由主义及其影响[J].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14(4):116-123.
- [29]黄伟合.英国近代自由主义研究——从洛克、边沁到密尔[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 [30]ABRAMS F W. Management's responsibilities in a complex world[J]. Harvard Business Review,1951,29(5):29-34.
- [31]LEVITT T. The dangers of social responsibility[J]. Harvard Business Review,1958,36(5):41-50.
- [32]MURPHY P E. An evolution: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veness[J]. University of Michigan Business Review,1978,30(6):19-25.
- [33]FREDERICK W C. The growing concern over social responsibility[J]. California Management Review,1960,2(4):54-61.
- [34]MCGUIRE J. Business and society[M]. New York:McGraw-Hill,1963.
- [35]FREDERICK W C. From CSR1 to CSR2;the maturing of business and society thought[Z].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1978:279.
- [36]BERGER I E,CUNNINGHAM P,DRUMWRIGHT M E. Mainstreaming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developing markets for virtue[J]. California Management Review,2007,49(4):132-157.
- [37]ZADEK S. Doing good and doing well:making the business case for corporate citizenship[R]. New York:The Conference Board,2000.
- [38]BELLAMY A J. The business case for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C]//American Marketing Association:Marketing and Public Policy Conference, 2015:370.
- [39]梅雪芹.工业革命以来西方主要国家环境污染与治理的历史考察[J].世界历史,2000(6):20-29.
- [40]万君宝,秦施洁.美国企业慈善的历史演进及长效机制研究[J].经济管理,2015(1):158-167.
- [41]RIFKIN J. The third industrial revolution: how lateral power is transforming energy, the economy, & the world [M].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2011.
- [42]MILLS M P,OTTINO J M. The coming tech-led boom[N]. The Wall Street Journal,2012-01-30.
- [43]王钦.新工业革命背景下的管理变革:影响、反思和展望[J].经济管理,2014(12):176-185.
- [44]CHOMSKY N. Profit over people:neoliberalism and global order[M]. New York:Sevem Stories Press,1998.

New Industrial Revolution and CSR: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evolution

XIAO Hongjun, LI Xianjun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836)

Abstract: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SR) is a new way to interpret the corporate behavioral pattern, deeply influenced by the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technological change, social and cultural factors. At the same time, as one kind of paradigm changes of social value creation, three industrial revolutions all began with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and accompanying changes of production modes and life styles, leading to a series of new social problems and making existing social problems more serious. In order to solve such problems, enterprises should take the initiative to promote the settlement of these issues, and at the same time, they need to fulfill social responsibility in response to social pressure in the context of ethos. Through the initiative and response, enterprises showed different performance mechanisms in the three stage of industrial revolutions. Besides, the three industrial revolution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show the trend of co-evolution. In the age of first industrial revolution, the businessman is the dominant power to fulfill social responsibility as “the era of businessman-leading CSR”, and then the corporation involves in “the era of company-oriented CSR” in the second industrial revolution and “the era of platform-leading CSR” in the present new industrial revolution.

Keywords: industrial revolution;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social problems; ethos

责任编辑:魏小奋